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 藏芳文存

# 朽者不朽

## ——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

胡 健/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 著者文存

# 朽者不朽

——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

胡 健/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朽者不朽：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 / 胡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

ISBN 978-7-301-20673-7

I. ①朽… II. ①胡… III. ①陈师曾 (1876 ~ 1923) - 艺术评论 IV. ①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2055 号

**书 名：**朽者不朽——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

**著作责任者：**胡 健 著

**责任编辑：**梁 勇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673-7/J · 044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0.75 印张 235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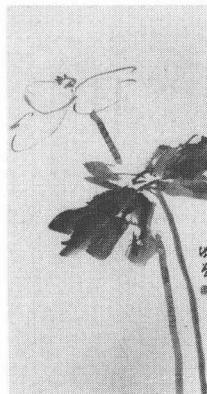
目  
录

题胡健《朽者不朽》	范曾
导 言	001

上 篇

陈师曾与之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人文环境

第一章 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思潮	009
一、“变器为道”与“中体西用”	009
二、“温故知新”与“推陈出新”	014
三、“精神”的科学与“物质”的科学	021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画坛	029
一、金石画风的兴起	029
二、近代商业文化对画坛的影响	038
三、南风北渐下的北京画坛	043
四、西学东渐下的中西绘画之争	054
第三章 陈师曾的家学渊源	065
一、义宁陈氏	065
二、南通范氏	079
三、文化贵族之家的人文脉络	087
四、陈师曾的家学印记	097
第四章 陈师曾所受“日本影响”	109
一、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	109
二、陈师曾绘画理论与创作中的“日本影响”	116



# 目 录

## 下 篇 陈师曾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b>第五章 陈师曾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b>	137
一、陈师曾主要美术理论解读	137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灵魂——《文人画之价值》	151
三、近代中国绘画史的鼻祖——《中国绘画史》	164
四、陈师曾美术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学术特征	168
<b>第六章 “以日新全其旧”</b>	
——陈师曾保守的革新实践	175
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	
——陈师曾对传统绘画的传承	175
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陈师曾对传统绘画的创新	205
三、以本国绘画为主体的舍短采长	221
<b>第七章 陈师曾文化保守主义的美术活动</b>	233
一、陈师曾与民初的美术团体	233
二、陈师曾与齐白石	250
<b>第八章 陈师曾与同时代的文化名流</b>	265
一、陈师曾与画坛传统派领袖	265
二、陈师曾与新文化运动领袖	279
<b>结 语</b>	297
<b>参考文献举要</b>	301
<b>陈师曾年表简编</b>	309
<b>图片索引</b>	317
<b>后 记</b>	325

# 导 言

## 一、问题的缘起

在清末民初的艺术界，陈师曾（名衡恪，号朽道人、朽者，斋号染仓室、槐堂，1876—1923）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在他去世时，梁启超沉痛地把他的死，比作中国艺术界的大地震，并评价他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sup>①</sup>

的确，在清末民初的画坛上，陈师曾有着耀眼的光辉。以“朽者”、“朽道人”自称的他无论在绘画理论上的阐述、绘画实践上的创新、美术社团的组织和中外绘画交流的倡导等方面，都有着堪称“不朽”的建树，特别是他对文人画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维护和保守，对文人画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变通和创新的强调，不仅影响着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代大师，催化了返归民族本位传统的新一轮思潮的出现，而且，对此后近百年中国画坛传统绘画的创新和发展都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精神领袖的陈师曾在清末民初画坛的形象是模糊的，一直徘徊在“朽”与“不朽”之间。在以往的美术史研究中，很多学者因其《文人画之价值》《中国画是进步的》等文章明确为文人画及中国传统绘画精神辩护而将其划入国粹派、保守派或正统派，进而在很多语境中被想当然地归类于只守不创、摹古而不思进取的一派，成为与“现代”、“进步”相对的所谓“朽”的势力；也有些学者因其明

<sup>①</sup> 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转自俞剑华：《陈师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确提出吸收西画技法，并在绘画创作中将西方美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西画技法引入中国画，以其《北京风俗图》、庭院园林写生画等迥然不同于传统绘画的作品而将其划入革新派、融合派或改良派，进而被归类于主张中西融合、以西法改造中国画的所谓“不朽”的一派；更多的学者是因强调他对中国画的“保守”而对他的绘画创作上的种种“不朽”的创新探索含糊其辞、视而不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陈师曾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其在近代美术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至今没有被客观地认识。

本书试图在充分运用史料和借鉴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陈师曾艺术思想、艺术创作、艺术活动的构成背景即陈师曾所处的时代环境、人文环境入手，通过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思潮、清末民初的画坛、陈师曾的家学渊源、陈师曾所受“日本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剖析，梳理出陈师曾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形成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陈师曾艺术理论体系、艺术创作实践、艺术社会活动以及与同时代激进与保守的文化名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对陈师曾在清末民初这段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客观准确的标记，并从对他的研究中揭示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及发展的源头。

## 二、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

陈师曾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一个风云板荡、新旧社会交接、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判断纷乱繁杂。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一个这样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保守主义是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一种思潮，一种关于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变革方式的理论。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1790年以《法国革命论》一书，奠定了近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基础，被誉为西方保守主义之父。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里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激烈批判，明确反对狂风骤雨般的激进式变革。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试图完全打破旧有秩序，幻想在废墟上建起新制度，最终只可能为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带来野蛮、暴力和独裁。他坚持一个国家的政体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模式而来，赞成柔风细雨型的渐进式变革。他认为个人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人这个物种却是聪明智慧的，经过累积和不断筛选而形成的传统正是智慧的宝库，人类需要靠这种智慧的指引，尊重传统意味着尊重人类整体的文明成果和群体长期积淀下来的习俗。西方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反对一切突然的革命和革新，维护传统社会纽带，如家庭、伦理、宗教等。它的核心主题就是要捍卫传统。<sup>①</sup>

在西方保守主义概念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保守主义概念。在汉语中，“保守”一词起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其文曰：“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sup>②</sup>其本意为保卫守护、保护保藏、保住。<sup>③</sup>但没有这一概念，并非就不存在这种思想。保守主义既然是一种态度，在任何政治活动中都可能出现。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就长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俯视历史长河，保守主义所处的时代语境、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其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精神却是不变的。

清末民初政局复杂多变，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取向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学者一般把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区分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分别进行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在文化上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清末民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思想家们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政治、文

<sup>①</sup> 参见柏克著：《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sup>②</sup>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卷8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65页。

<sup>③</sup> 参见《汉语大词典》“保守”条的解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8页。

化危机。其基本的文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适合近代特点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它在根本点上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相对立，同时它又不同于虚骄自大、故步自封的顽固思想。

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对立，比较容易理解，而它与顽固思想的区别却似乎有些模糊。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崇尚激进，鄙视保守，“保守”一词往往和“顽固”连在一起形容一种僵化的思想，因此在人们印象中“保守”和“顽固”一样带有贬义。以至于有的学者为免遭误解，特意将“文化保守”改成“文化守成”。其实，保守（主义）是对英文 Conservative 一词的直译，在英语中，Conservative（保守）一词并无贬义，故英国有保守党。文化保守派与顽固派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保守派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顽固派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一统天下。“主体”是因多元而分主次、体用，“一统”则是一元、清一色。如果没有西学的引入，便不存在“主体”或“一统”的问题。所以，二者的不同最后还是落到了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文化保守派不绝对否定西学的价值，但持中本末的文化取向，顽固派则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文化保守派为了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主张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创新，所谓“以日新全其旧”。他们引进西方文明，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是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的目的。他们表面上是求新、求变，但深刻用意是以此挽救国家，保守传统。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非一味守旧，而是要维护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为文化的发展找出一条不被打断的出路。同样，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不等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更不能认为它们对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阻力。”<sup>①</sup>对文化保守中的“保守”一词我们应从其本意上客观地理解。本文中所指的“保守”即指其本意，而非人们习惯的已搀入偏见的“保守”之意。

① 汤一介：《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 页。

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具体情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包含如下的内涵：第一，承认中国文化具有优秀部分；第二，不排斥西方文明，正视西方文明的长处；第三，主张中国未来的道路，应建立在以发扬、创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有选择地汲取西方精神和物质文明之上。具体到清末民初的画坛，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sup>②</sup>的文化取向，其代表人物即为陈师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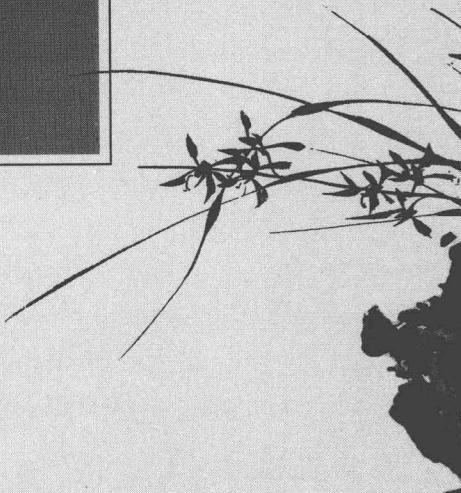
② 陈师曾：《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编《绘学杂志》第1期，1920年版，“讲演栏”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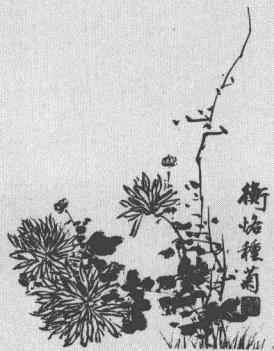


上 篇

陈师曾与其所处的时代

环境及人文环境





第一章 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思潮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画坛

第三章 陈师曾的家学渊源

第四章 陈师曾所受『日本影响』

## 第一章

# 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思潮

### 一、“变器为道”与“中体西用”

#### (一) 文化危机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崛起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和思想主流，晚清的文化危机是以儒学颓危而展开的。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儒学危机就已出现，1644年（李自成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士大夫承受着天崩地裂般的震动，但因“经生寡术”，空有一腔抱负却不知如何拯救社会。束手无策的读书人把满腔怒火发泄到理学上，一时理学被骂为“亡国之学”、“误国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五百年之久的理学大有一推即倒之势。但清王朝很快宣布尊奉程朱，于是，中国儒学的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就夭折于清王朝的入主。自清圣祖康熙以来，理学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康熙命人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明确宣称朱子之学乃“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sup>①</sup>一般人是不敢比拟圣贤的，更何况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逾此”呢？这无异于阻塞了儒学的自新之路。清统治者反对“处士横议”，设帐招徒。乾隆朝被处死的理学家尹嘉铨罪名之一就是“妄比刁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sup>②</sup>。其实，与其说清初统治者是在“尊奉”理学，

<sup>①</sup> 康熙帝：《御制朱子全书序》，《御制朱子全书》，康熙五十三年（1714）版，第7—8页。

<sup>②</sup> 参见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

还不如说摧残理学更为贴切。他们一方面将理学高高挂起，奉为庙堂之学，不许人们公然渎犯，科举考试也以程朱说教为范围；另一方面，又不许人们去研究、创新、发展理学。理学的学术研究江河日下。康熙后，再没有出现著名的理学家，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sup>①</sup>理学就这样不死不活地与清王朝一起走过了二百六十余个年头。

① 章炳麟：《訄书》，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持续的儒学危机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此间，中国不仅开始落后于世界，而且文化成就也不及前人，科技领域没有出现很突出的发明创新，规模浩瀚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之类只不过是将古书编辑在一起，以其规模的空前而傲视古人，此外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创造性。以考据学为代表的清代史学往往是低层次的史料整理工作，当时就有学者批评：“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sup>②</sup>在文学领域倒是出现了《红楼梦》等几部小说，但清统治者却以为之耻，并为“净化”文坛而一直进行着毁禁工作。在康乾盛世，由于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转移或缓解了士大夫们对文化危机的注意力。然而，从乾隆末年开始，清王朝陷入了王朝没落的危机之中，国家机器的腐化，人口的膨胀，土地集中的加深及由此导致的农民起义的蜂起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南沿海的挑战更预示着古老的中国将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危机的到来顿时使学者们感受到文化危机的严峻，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次暴露出其致命弱点——无力应付世变，中国学者们又一次面临其前辈在清初所承受的报国无术的困扰。本来，儒学是有体有用、有本有末的“内圣外王”之学，其内可修身自省，外可治国平天下。但已成疲软之势的理学自然早已丧失了“外王”功能，内圣的信条又为官僚士大大的腐败所践踏，成了空洞的说教。

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及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固有的文化危机更为加剧。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战争并不尽为阶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4页。

级利益之争，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文化观念之争，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思想、行动等方面来看，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否定儒家文化的倾向。曾国藩<sup>【图1-1】</sup>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sup>③</sup>并非夸张之语。他起而镇压太平军就有着捍卫传统的意义，所以，他正式提出了“卫道”的号召。此时儒学的危机更甚于从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有力地打击了儒学中的夷狄观念和天朝上国意识，在西方文明开始涌入的情况下，中国士大夫中甚至有人产生了文化将要灭亡的恐惧。王韬就曾说：“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sup>④</sup>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将要灭亡的恐惧，促使他们奋起卫道。而这三次内外战争也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些机缘。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其卫道的初步成功，使其卫道的信心有所增强，并使得一些有抱负的士大夫登上了政治舞台。西方文化的涌入又使其认识到卫道的紧迫，加之中国的开放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于是他们探索着重振中华文化的途径。终于以冯桂芬的名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sup>⑤</sup>为标志，文化保守思潮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晚清社会。

## （二）清末民初“中体西用”的新陈代谢

19世纪是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后一章，也是清代儒学较具活力的一个时期。文化危机的加剧、反传统运动的兴起在瓦解了儒学的若干信条、观念的同时，也把儒学从某些固定的框套中解放出来，并激发了儒学的一些活力。于是从嘉庆朝开始，儒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一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出现了汉学与宋学的合流，陆王心学也逐渐见容于正统儒学，19世纪儒学的正统——理学对“异端”基本上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二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开始注重经世致用，



图1-1 曾国藩像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⑤ 冯桂芬：《采西学议》，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图 1-2 魏源像

① 魏源:《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海国图志》卷 76,《魏源全集》第 7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866 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 4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③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4—495 页。

④ 薛福成:《筹洋刍议》,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0 页。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 页。

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3 页。

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1、297 页。

注重恢复儒学的“外王”功能。将西学纳入到经世之学,最早是由晚清经世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图 1-2】进行的。他在《海国图志》中借引用外人之语说:“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环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sup>①</sup>于是传统的天朝上国意识和夷狄观念开始被突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理论<sup>②</sup>。此后,寻求域外新知开始在经世派人士中成为热点,西学在经世之学中比例越来越大。虽然这时的“西学”一词是由“技”、“术”等词来替代的,但这在中国近代的西学引进方面意义非凡。而曾国藩则进一步将经世之学与理学并列,他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sup>③</sup>据此可见,经济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已与理学并列。既然经济之学已与理学并列,那么西学必然作为经济之学的一部分而与理学并列,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意义深远。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被公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滥觞。19 世纪 70 年代,从洋务派中分化出的一些早期改良派人物薛福成、郑观应、王韬等人,也都提出类似中体西用的主张。薛福成:“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sup>④</sup>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sup>⑤</sup>王韬:“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sup>⑥</sup>,“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而已。”<sup>⑦</sup>“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明确提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6 年 4 月,曾任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主笔的沈寿康在《匡时策》一文中称:“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sup>⑧</sup>同年 8 月,清政府工部尚书